

广西侗学丛书·作家作品选集

多梦时节

杨进恒 著 DUOMENG SHIJIE

广西人民出版社



杨进恒

1956年出生于广西龙胜县。
当过农民、工人。1978年入桂林地区教育学院中文科学习。毕业后曾任教师、文化馆辅导员，现在龙胜县文化局工作。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已发表小说、报告文学、戏剧文学作品30余万字。广西作协会员。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多梦时节 / 杨进恒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广西侗学丛书·作家作品选集)

ISBN 978-7-219-06870-0

I. ①多… II. ①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4484 号

责任编辑 张 平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排版设计 南宁广印企业策划有限公司
印 刷 广西美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41
字 数 7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ISBN 978-7-219-06870-0/I·1262

定 价 168.00 元(全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广西侗学丛书·作家作品选集

多 梦 时 节

杨进恒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1 / 多梦时节
- 31 / 小世界
- 50 / 瘟猪的一种吃法
- 69 / 地主与长工
- 83 / 桥 墩
- 110 / 七奶的故事
- 119 / 归去来兮
- 146 / 你住在我家斜对门
- 154 / 妻子的不幸
- 161 / 总 理
- 171 / 去城里过年
- 184 / 人情债
- 199 / 后 记



多梦时节

假如我没有过每个人必须有过的二十岁，假如我在二十岁的时候便能像今天这样冷静地思考问题，认识世界，那么，便不会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长久地折磨我了。

一

那年，我二十岁，正是人生多梦时节，像许许多多比我年轻一岁或两岁，却有着和我同样命运的高中毕业生那样，我背着铺盖，提着那只用了两代人的木桶，走了几十里山路，回到了家里。我不知道，山寨里正有这样一个故事在等待着我。

母亲正在门口的石板路上晒谷子，见到我连连用手背抹了几回眼泪。她不是哭，她有泪囊炎，眼角经常挂一颗浑浊的泪珠。

上楼梯的时候，母亲说我又长高了一些，长了半块豆腐高。其实，我知道自己并没有长高，且坚信自己永远也长不高了。我是父亲的遗腹子，父亲在母亲怀我八个月的时候，晚上到山里狩猎，落进人家装山的滑套，吊离地面两尺多高。套主第二天上山收套，父亲已吊成硬条条的了。母亲命苦，只是哭，却把我过早地哭了下来。“生七不生八，生九一枝花。”人们都说怀八个月的婴儿多半难带，可母亲只吃了两只鸡，外带一串腊山鼠，便奇迹般把我带活了。我刚满月，母亲便带我去看先生。八字先生说：“你盘养这娃崽就像扛一只老虎翻坳，要翻过坳才说得准啊。”果然应了这位老先生的话。我两岁前从没拉过一回硬屎，两岁半才走得路。八岁上学，智力平平。一年级时留了两回级

才上二年级。直到读高中，全班算我年龄最大，却坐在讲台下的第一排。

记得，我小时候非常羡慕二十来岁的大后生。他们可以穿有屁股荷包的西裤，铜头皮带亮闪闪地镶嵌在瘦瘪瘪的肚皮上，可以有一把斜挂在肩上的手电筒，穿村走寨地坐妹对歌，还可以插一把半长不短的烟袋在裤腰上，神气活现地用艾草和公佬们对火，然后叭叭地抽上两口，还可以……总之，二十岁之于我，简直是一个充满五光十色的神秘的梦！

然而，我的二十岁竟是这样平常：没有皮带，没有电筒，没有烟袋。我不走寨，更不唱歌。回到家后第二天，母亲便从火塘上抽下一根青冈木，让下屋清明哥帮我削成锄头把。于是第三天，我便怅然若失地扛着新锄头，和队里的三等劳动力们下田搞双抢，刮水脚去了。

当时正值双抢大忙季节，割谷子，踏打谷机，挖田，耙田，每天黎明即起，月出方归。披星戴月，雨淋日晒。这繁重的劳动对我这样一个身体单薄的人来说无论如何是吃不消的。每天收工回家，我浑身便像散了架似地躺在晒楼的条凳上，母亲把饭送到条凳头放下也不想吃。母亲忧心忡忡地望着我，眼角的泪滴在松明火上一闪一闪的。

“听说五里塘的建革工作去了，你要能出去当干部，就免得在家翻禾莠受苦了！去问问支书啊，几时轮到你？”母亲拉了条独凳在我身边坐下。在她看来，凡到过山外读书的，就非当干部“吃官粮”不可。

“阿妈，你连想都不应该这么想！”心里烦躁，我口气有点冲。我知道，凭我这种个子，凭我家这种条件，就是整个大队的后生都当干部去了也轮不到我的分上。建革是什么人啊，是支书的内弟，小舅子！

二

九月初的一天中午，我和母亲收工回家，正摆开桌子准备吃午饭，支书突然来到我家里。我做梦也想不到支书有一天会光临我家这低矮的木楼，我和母亲都感到十分意外和吃惊。母亲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找板凳时差点把饭桌碰翻。不是我手脚快，那一大碗冬瓜就撒进火塘边的灰堆里去了。

支书接过母亲用衣襟擦了又擦的小板凳，在火塘边坐定，笑眯眯地对母亲说：“嫂子咧，你家娃崽有出息了。”

“全靠支书好领导啊。”母亲不知怎么竟蹦出了句非常时兴的话。接着回过头对我说，“还没给支书斟茶！”我连忙起身，从碗架上拿下一只变黄了的饭碗，又从用豆腐乳罐代替的茶壶里舀出一碗茶，递给支书。当时，我心里不知怎么竟想道：我一定要买一个热水瓶和几个玻璃茶杯！

支书接过茶碗，一口喝了。一点也不嫌弃那只有锯齿缺口的发黄的碗。他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烟，放到嘴上，刚想划火柴，想了想，又从嘴上拿下来，丢给我，说：“昌平，抽口烟。”我心一急，没接住，掉进灰里。于是连忙捡起来，吹掉粘在烟上的灰末。

“哎呀，臭虫吃客，臭虫吃客！哪好抽支书的烟！”母亲一连声说道，“快还给支书！”

“莫客气，莫客气，二天你有了出息，我再抽你的黄屁股烟仔。”支书挡住我的手，突然问我，“昌平，你有十七岁了吧？”

“是哩是哩”母亲在人前总喜欢把我的年纪往小里讲。

“不，我妈算错了，我五七年出生，十八岁了。”我也对自己的年龄打折扣。不过我比母亲聪明些，我知道，参军，招工，招干等，年龄一般要求在十八岁以上。

“好好，十八岁好，能挑大梁了。”支书连连抽了几口烟，“是这样，今年元旦，公社要搞会演，会演，懂吗？各大队都要到公社唱戏比赛！县宣传队这几天有人在公社开班辅导，公社来通知，每个大队派一个青年人去参加培训。党支部研究决定，派你去。”

“我？支书，我哪懂唱戏！”

“哎，不要谦虚嘛，过分谦虚的话等于骄傲。你在学校的时候不是唱过戏吗？”

“可我，那回演的是红小兵。”我回答道。在学校时，有那么一次，班主任自己编了一个节目，叫做《峻岭青松》，写的是一个红小兵配合护林员抓住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山里的逃窜分子，历史反革命。因为我生得矮小，班主任竟物色我演那红小兵。记得，剧本写得很不错，情节跌宕起伏，红小兵智勇双全，护林员临危不惧。班际会演，这个节目获

得一等奖。

“支书，这事你得让我好好想想……”话没说完，母亲踩了我一脚，我赶紧闭上嘴。

“支书啊，以后靠你多教育帮助，我这娃崽虽说没什么力气，可嗓子好，能跳能唱，在家里，每天晚上唱歌唱到半夜。唱，唱红歌。”母亲额上的皱纹舒展开了，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我只觉得鼻子一酸，连忙把脸偏过一边去。我每天累得像头牛，晚上躺下便呼呼入睡，哪来神气唱歌啊！

“好，这就好！昌平，这是大队党支部交给你的光荣任务。你明天就到公社报到，学习二十天，生产队记一等劳动力工分。回来后，马上在我们大队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争取今年元旦文艺会演取得好成绩。”支书拍拍我的肩膀，叮嘱了一番。我默默地点着头。为母亲，也为我自己。

支书又点燃一支烟，对我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便起身告辞。母亲连忙拴上火塘门，强留支书吃午饭。她说支书第一次跨门槛，一定要打湿嘴巴，吃多吃少领个情。支书强不过，只得又坐下。

母亲忙把那碗冬瓜热了一遍，又从坛子里夹出半边留了一年多的酸鸭肉，还把摆在苞谷缸上攒来抱小鸡的八个鸡蛋全部下了锅。一切弄好了，母亲把我叫进房里，压低声音对我说：“你没得酒量，去下屋叫你清明哥上来陪支书喝两杯，就讲我们家来了客。”

清明哥是大队民兵营长，和支书是老熟人。我到了他家，把事情和他一讲，他一跳两尺高：“干，干出个样子来，你学习回来后，我第一个报名参加文艺宣传队，搞它个热热闹闹。”他把他家中那坛红薯酒往肩上一扛，“走，喝酒去！”

那天中午，我们吃了很久。支书醉了，清明哥也醉了。他俩手舞足蹈，在我家堂屋里又唱歌又跳舞，还讲对口词。

三

二十天后，我从公社学习回来了。

我觉得，二十天的学习，我大开了眼界，学到了许许多多以前根

本没听说过的东西：丁字步啦，一字步啦，云手啦，亮相啦，移植彩调《沙家浜》啦……我对自己，对大队文艺宣传队，以至于对会演充满了信心。

我走进大队部，找支书作了汇报，并在他面前做了几个基本功动作。他乐得一个劲拍我肩膀。“我没看错人啊，没看错人。啧啧，二十天时间，就学会了那么多手脚。有出息，有出息得很！这次会演，保管得第一名！”他马上广播通知全大队青年，晚上集中大队部开会。

晚上，大队部会议室里，汽灯发出丝丝的声音，把四壁照得亮晃晃的。室内坐满了来自十七个生产队的上百名青年男女。人人脸上显出严峻的神色，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神圣的任务。

支书讲话，极富煽动性。他读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和“在旧戏舞台上”两段毛主席语录后，接着来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重点讲了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队的重大意义。最后交给我两张纸，让大家报名。

大家忸怩了一阵，谁也不好意思第一个报名。我正用眼睛在人群中找清明哥，想让他带个头。忽然人堆里站起一个穿红衣服的妹子，高声喊道：“我报名！”我回头一看，是支书的大女秀琴。

“吴清明，报一个！”清明哥忙不迭冲到我面前。在他的带动下，男青年们呼啦一下把我围住了，一下便有四十多个后生仔报了名。

可是，女青年除去秀琴外，再没有第二个主动报名的了。女人堆里，大家窃窃私语，你推我搡，就是没人站出来。我僵立着，不知该怎么办好。

“我帮报一个，吴妮花！”清明喊了一声，人们顿时哄堂大笑。妮花是清明的妹妹，可却一点也不像他的哥哥。她生得又矮又小，讲话细声慢气，见人未打招呼先脸红。听见清明帮她报名，她羞得连耳朵根都红了。

接下来又是长久的沉默。后生仔们又一直在一边打嘻哈，妹子们就更加不敢讲话了。我正束手无策，感觉有人在拉我的后衣襟。回头一看，秀琴站在我身后，汽灯下，她两眼闪闪发光。

“跟我出去一会儿。”她声对我说，自己先出去了。我不知什么事，便跟了出去。她正倚在荒坪上的破篮球架边等我。月亮把她的轮廓清

晰地勾勒出来：椭圆的脸蛋，高高的鼻梁，漂亮的前额，因刚洗过而披散的长发；她不算高，但四肢匀称，身段玲珑，浑身洋溢着一种青春的美。使人想起月光下拂过水面的垂柳。

“昌平，你把那伙妹子的名字都写上，她们都很想参加文艺宣传队，就因为人多不好意思报名。”等我走近她身边，她对我说。

“是吗，这样真好，真是好得很。”我语无伦次地答应着。我和秀琴读中学时虽同一年级，但不在一个班上，平时从来没说过一句话。并且他父亲是大队支部书记，她母亲是大队赤脚医生，在我们这偏僻的山寨里，这样的人家与一般人家比起来，已然是天上地下了，更何况我这种单亲家庭！因此，我在她面前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以前在去学校的路上，看见她从后面走来，我也要躲进茅山里，让她赶过去后才隔得远远地跟在后面。我做梦也不敢想有一天敢和她面对面地讲话，并离得这样近。我当时心里突然就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不知她晓不晓得她的父亲在我家里吃过一顿午饭？

她到底知不知道他的父亲在我家吃过饭？这个念头一整夜在折磨着我。

我心神不定地把妹子们的名字都写到信纸上去后，前后一数，竟有近八十多人报了名。按支书的意思，宣传队最多只要三十五人。他把我和清明拉进他的办公室，按报名者的现实表现，历史表现，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以及外貌形象等各方面的情况，圈掉了四十多个名字。并当场任命清明当宣传队指导员，我当队长兼导演，秀琴任副队长。名单落实后，支书让我当众宣布。

我把名单一宣布，会议室里意外地出现了长久的沉默。突然，墙角里传出一阵细细的抽泣声。我转过脸去，是妮花。支书说要照顾面上，留下他哥而把她的名字涮掉了。她大概心里很难过，肩膀一耸一耸的，正在哭泣。清明看见了，满脸憋得通红，突然大喝一声：“哭什么哭，文艺队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明年还可以创造条件争取！再哭给你两拳头！”妮花哇的一声，低头冲出了会议室。等我赶到门口，她已转过篮球架边不见了。

我心里很难过。我和妮花上家下屋，从小便很要好。我读书这些年，她常上我家帮我母亲忙家务。冬天，还陪母亲过夜，给母亲暖脚。

母亲病了，她便给母亲刮背痧、拔火罐筒。母亲爱她胜过自己的亲生女，她也把母亲当做自己的娘老一样孝敬。今天晚上，虽说一切都由支书作主，可我心里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不起她的事。

散会后，我和清明哥同路回家。我们各想各的心事，一句话也不说。路过他家门口，听见妮花还在屋里嘤嘤地哭着。清明哥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妮花太任性，你以后可要好好教育她啊。”他的声音有点发抖，朦胧的月光下，只见他眼里含着眼泪，亮晶晶的。我连忙低下头去。

这一夜，我心里沉沉的，好像有一块磨盘重重地压在心口上。

四

紧张的排练开始了。每到晚上，队员们便兴致勃勃地聚到大队部。我从基本功教起：两腿并拢，收腹挺胸，手心向下，手臂平肩伸直；走台步，转台角，小踮腿，大劈叉。这些年复一年挖田种地背柴挑柴的少男少女们，这些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妹仔后生们，这些还没进十一月手脚便开始裂口子的演员们，手脚像是绑上木棒似的，直条条，硬邦邦。妹仔们旋转起来像是纺棉花，后生们舞动起来像是锯木头。怎么教也教不会。我不得不一个个地作示范，手把手地纠正动作。我指手画脚，一下成了人们的中心。就像踩在一堆软绵绵的稻草上，脚下总有一种轻悠悠的感觉。

“昌平，快过来，这样做到位了没有？”秀琴正靠着墙边下腰。她练得刻苦，接受又快。虽然对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无可挑剔，但我还是喜欢在她身边指指点点。或抬抬她的手臂，或给她压压腿。不管我说什么，她都虚心接受。谦恭而不虚伪，热情而不故作。通过几天的接触，我对她有了比较全面和正确的认识：她没有因家庭的优越而居高自傲，反而比寨上一般的妹仔更热情大方，平易近人。

我走到秀琴身边，她穿件红秋衣，四肢着地，身体像一道虹。丰满的胸脯像要从秋衣里崩出，一览无余地展现出它美丽的轮廓。我的心怦然跳动，一种从未有过微妙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

晚上睡到床上，我眼前老是晃动着秀琴下腰的美丽身影。在我最

初的人生经验中，秀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那夜老是睡不着，心里反复暗自嗟叹：这么完美的女人啊，不知世界上哪一个男子有福享受！

几个简单的基本动作教过之后，便准备排练移植彩调《沙家浜》中的第四场《智斗》。秀琴扮演阿庆嫂，清明哥扮演胡传奎，我扮刁德一。主角落实下来后，开始啃剧本。秀琴两天时间便背下了全部台词，可清明一个星期过后还背不下三分之一。他不大认得字，常常急得满头大汗还记不住下一句。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遇皇军追得我……吭吭……呀，×你娘，又忘了！最后翻一回书，再背不下就两拳头！”他翻开书，狠狠朗诵了一阵。但合上书刚背得几句又卡壳了。他果然朝自己的脑袋嘭嘭地擂了两拳。可仍然不管用，他急得抓耳挠腮。

离会演还有四十多天了，台词还没有拿下来，我也急了。正在这时，公社忽然来了通知，元旦会演全部要上自编自演的节目。清明哥松了一口气，却把我难住了。支书也急了，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要我一星期内写出一个戏来。

我刚想推辞，秀琴从门外进来。我不好意思开口了。

“这样吧，”支书指了指我和秀琴，“你俩都是高中生，放你们一个星期的假，生产队记一等劳动力工分。”

秀琴两只明亮的眸子紧紧盯着我。

是支书的政治压力所致，抑或是秀琴那两只眸子有着神奇的力量？当晚回家，我便把剧本想出了个大谱子。第二天，我把构思对秀琴详细地谈了一回，她听完后拍手叫好，说我的构思非常妙，既突出政治，配合中心。又有很好的戏路。直夸得我整个人晕晕乎乎的。

“昌平，我相信你能写好。”两只亮闪闪的眸子又一次久久地盯着我。

我被一种激情折磨着，坐到支书的办公桌前，铺开草稿纸便写了起来。题目是《一头猪》，内容是一位老村妇养了一头一百多斤的肥猪，准备杀来过年。腊月二十三，天降大雪，老头子忽然提出来要把猪卖给收购站，老婆子不同意。于是，二人唇枪舌战，闹开了矛盾。矛盾

高潮，两人厮打起来。正在吵闹，有位基干民兵冲进屋来通知两老去参加斗争大会。老头子问清缘由。原来，有个死不悔改的地主分子趁大雪天到生产队猪场投毒，药死了三头准备上缴给国家的大肥猪。被民兵当场抓获。这事对老婆子震动很大。老头子因势利导，向她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要老婆子立足侗寨，放眼全球，要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写着写着，自己也被感动了。我丢下笔，站了起来，秀琴正倚在窗户边望着我。我俩的目光碰在一起，我连忙低下头去。

“秀琴，我有几个字把不准，你帮我誊写一稿吧。”我第一次在她面前说话感到很随便。

秀琴甜甜地答应着，很快便从代销店买来一本方格稿纸为我誊写剧本。我俩并排坐在办公桌前，我写一页她抄一页。手臂时不时碰撞一下，于是，我俩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会心一笑。

“笃笃笃”传来了怯生生的、犹豫的敲门声。秀琴拉开门，见妮花正捧着一个饭篓站在门外。

“昌平哥，哥让我给秀琴姐送饭来。”说完把饭篓放到办公桌上。

我这才猛然醒悟，只顾写剧本，我们还没吃午饭呢。秀琴家离大队部所在地有五里多路，亏得清明哥心细，不让妮花陪我饿肚子。

“我也该回家吃饭了，妮花我们走吧。”我从桌边站了起来。

“我装了蛮多，够你们两人吃的了。”妮花说。

“妮花，我们一起吃啊。”秀琴说。

“我吃过了，就要出工。”妮花从门边拿起斗篷和锄头。我知道，队里正开大寨田，工夫很紧。看着她娇小的身影消失在村道的尽头，不知怎么，我突然就觉得她很可怜。

天黑下来，我的剧本也写完了第一稿。我丢下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真想不到自己居然能写剧本，并在一天之内写出长长的三十二页。我望望秀琴，她正微笑着看我。脸上分明现出由衷的钦佩。

我和秀琴走出大队部的时候，她忽然从衣兜里掏出一角五分钱，极不自然地对我说：“我爸说，大队每天给你一角五钱伙食补助，这是他让我给你的。”说着把钱放到我的手上。

这是我第一次吹糠见米的收入啊！（多年后，我常常在想，那是我

平生的第一笔稿费)回家后,我把钱交给母亲。她放在手上端祥了很久很久,脸上现出无比欣慰的笑容,嘴里不停地喃喃着:“全靠支书啊,这回你可真是有出息了,日不晒雨不淋,每天记一等劳动力工分,还得两个鸡蛋钱,十天就是二十个鸡蛋,啧啧!”她把钱转放到我手上,“这钱你自己留着用吧,你长大了,外面朋友多,交用大。我刚抱了一窝鸡崽,下个月就出窝了,等卖了钱,给你买一件卫生衣。唉!”母亲突然叹了一口气,“要是上级让我们养五只母鸡就好了!”

我鼻子酸酸的,想哭。

五

一个星期后,剧本改完了。接下来是演员人选问题。我们三人小组商量了一下,决定让秀琴演老婆子,可这老头子让谁演合适呢?我心里忽然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

“清明哥,你来吧。”我对清明说。

“不行不行,”他连连摆手,“我脑瓜笨,记不下那么多台词,影响会演。”

我总不能自己提自己的名字,来个毛遂自荐。于是便把剧本向大家读了,让大伙讨论。我剧本还未读完,大家便笑叉了气,待我宣布秀琴演老婆子,还要找一个男演员演老头子时,妹子们都把头勾进膝盖里,后生仔们却轰的一声喊了起来:

“呜呼,一男一女上台演两公婆,没见过!”

“还要在台上打架呢,过瘾啊!”

“哈哈哈哈哈!”

嘭的一声响,清明哥在桌上擂了一拳,满脸憋得通红。“×你娘,哪个再闹,我给他两拳!”他声如牛吼,人们立即静了下来。“这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闹封建,闹资本家(小资产阶级)!”

“你不闹资本家你来演老头子啊,清明哥!”不知谁在墙角喊了一句。

清明哥愣了一下,口气软了下来,“我要能演还用你们讲?我没得文化,背不下台词,怕影响会演,给大队抹灰。”他停了停,“冲我喊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昌平，你来演！哪个敢笑，挨我两拳！”他话音未落，人群里便传出压抑的吃吃的笑声。

“哪个笑？哪个笑？”清明哥捏紧拳头，不停地转动脑袋扫视人群。他忽然指着墙角一个后生喊道，“庚旺，讲清楚，你为什么笑？”

庚旺长得又高又瘦，是文艺队的一个大活宝。说话幽默而带几分刻薄，做事少年老成而又有几分工于心计。在文艺队里，常常讲些不三不四的话让人捧腹不已。支书本来不想让他参加文艺队的，但他既会拉二胡，又会吹笛子唢呐，还会打铜锣。台前幕后，事事离不开他。在整个文艺队里，他只怕清明哥一个人。听清明哥叫他，他老老实实地站了起来，眨巴了一下眼睛，故意装成十分害怕的样子，嗫嚅道：“大家讲，让昌平演老头子，那是老鼠爬背篓，所以发笑……”话音未落，人们便哄堂大笑起来。

我又气又羞，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们那地方把老婆高大壮实而老公矮小瘦弱的夫妻比喻成老鼠爬背篓。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这时，秀琴讲话了，她的口气有点做作的严肃：“大家莫笑了，听我讲一句。我们女的看上去显得高，其实我比昌平矮。我俩比过的，不信我比给大家看，我比他矮一根横指头。”她说着，走到我身边，“看看，不假吧！再讲了，我演老太婆，可以勾腰，驼背，这样就显得比他更矮得多了，是吧？”

这下，人们反倒不笑了。大家都被秀琴这一大胆的行为惊呆了。大眼瞪着小眼，一个个呆若木鸡。

我没想到秀琴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和我比高，更想不起我俩以前什么时候曾经比试过。我感激地望着她，心里感觉暖暖的，就像小时候在寨上被人欺负而得到母亲的保护那样。

六

十月初七，母亲突然病了。开始只说是头昏，筋骨疼痛，吃不下东西。后来，躺下竟起不了床，三天内滴水不进。庚旺到我家里看望母亲，把我拉出堂屋外面，对我说：“人老了，最怕的是吃不下东西，得赶快送医院。”我心里没有主意，找清明哥商量，瞒着母亲把家里那头架

子猪贱卖出去，便由清明哥和庚旺抬着，我和妮花护送，把母亲送进了公社医院。

医生诊断后，说是患重感冒，加上营养不良，身体衰弱。只要住院输液，精心调养一段时间便会康复。我一颗悬吊着的心才稍稍放了下来。

我又为排练的事着急起来。离会演只有二十来天了，我既要赶排《一头猪》，又要指导几个舞蹈、对口词的排练，队里离了我几乎什么都做不成。清明哥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妮花留下服侍婶子，我们三人立即赶回去，不要影响排练。”

“这怎么好呢，怎么能劳累妮花呢。”我很诚恳地说。

“这是她应尽的责任。怎么，你不放心吗？”清明哥问我。

有妮花在母亲身边，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当晚，排练结束后，我从墙上取下书包，正想把剧本放进去，却发现书包里有一沓钱，竟有二十多块！我觉得奇怪，问正在取汽灯的清明哥，他说是大家凑的，一点点心意。当时，大队部只剩我、清明哥和秀琴三人。看着一张张一角两角或伍角的毛票，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知道，这些钱大家都来之不易。

“收下吧，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婶子的。”清明哥把钱塞进我的口袋里。

“哼，你们凑钱，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看不起我啊！”秀琴忽然冲清明哥愤愤地说。

“凑什么啊，连我也不晓得，大家都是把钱悄悄交给庚旺，庚旺没得法，才把钱放到书包里的。”清明哥连忙解释。

“这些人，太小看人了！”秀琴无不恼火地说，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五块钱递给我。“昌平，给你”。

“我，我不要。”我很不好意思地推辞着。

“收下吧，别人看不起我难道你也看不起我！”她忽然放低声音，充满柔情地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努力做好文艺队的工作用以回报大家。每天，天刚亮我便往医院跑，天擦黑，我又回到寨上，第一个到大队部点亮汽灯，烧暖火塘。虽然辛苦，心里却觉得轻松。